

# 把校舍真正建设成第一避难所

■刘涛

4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,针对一些媒体在芦山灾区拍到的汶川地震后重建房屋墙体开裂、脱皮等情况的照片,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和求证。专业人士表示,对有些校舍墙体的开裂、脱落要科学认识,主体结构受损才能算危房。芦山县初级中学部分建筑场地的墙体受破坏在预期之内,达到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要求的小震不坏、中震可修、大震不倒的抗震设防目标。另据中国教育报4月22日报道,在芦山地震发生时,该县在这川地震后修建的校舍无一垮塌,有效保障了在校师生的生命安全。

汶川地震中的校舍坍塌事故可谓教训惨痛,后续的诸多声音为中国国家形象抹上了厚厚的阴影,校舍安全问题一时间成为灾难报道中的一个敏感话题。相比较而言,芦山地震中“在汶川地震后修建的校舍无一垮塌”值得肯定。它传递了一个暖人的警示信号:安

全不再是一种奢望,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姿态和结果,我们完全有能力将生命寄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在灾难面前,给生命一个安全的承诺,不仅是可能的,而且是现实的。

“要把学校建成最安全、家长最放心的地方。”中国政府于2009年实行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,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一轮的校舍安全排查工作,对校舍安全做出了明确的分级别和安全指数要求,以期推进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。在这次芦山地震中,新建校舍承受住了七级地震的摇晃,它托起的不仅仅是生命本身,更是一种新的希望。

学校是孕育理想和希望的地方,保障校舍安全,关乎民族的未来。在校舍安全问题上,如何强调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在地震频繁的日本、智利、美国等国家,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校舍安全的民生保障立法进程,学校被列入了紧急避难场所的建设范畴,校

舍的安全标准因此更为“苛刻”。

1933年,美国长滩发生6.3级大地震,众多校舍被毁,加州政府随即通过“菲尔德法案”,详细规定了建筑设计标准、监管机构、审查程序、惩罚措施等内容。在智利,为了推行更高标准的建筑抗震规定,政府出台了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,确保所有校舍都能够“按抗9级地震设计”。日本早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后就着手制定校舍安全政策,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开始实施“校舍补强计划”,对不具备抗御7级地震的校舍进行加固,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后,日本政府迅速启动了面向45万所公立中小学校的“五年补强计划”。

这些国家的防震思路非常清晰,学校是所有灾难的第一避难所,无论地震有多严峻,孩子们们的校舍不能倒。一旦发生灾难,学校的功能不仅仅是保护孩子们的安危,更是立即成为人们避难的中心。

国外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提醒中

国,加强校舍安全建设,必须走法制化道路。其实,中国的校舍安全政策并不是一片空白,从1986年发布的《中小学建筑设计规范》开始,目前发布的有关校舍安全建设的政策和规定不下二十个。其中,汶川地震后,多部委联合颁布的《关于做好学校校舍抗震安全排查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成为最具分量的一份指导性文件,要求“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级各类学校校舍进行一次全面排查”。

在校舍安全问题上,每一次灾难发生,总是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相关的法律或政策保障问题。然而回过头来才发现,相关的政策并不是没有,也不是很少,而是早早地搁在那里。在如此之多的政策框架内,为什么校舍安全事故无法根除?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,除了政府投入不足、政策制定时对现状估计不足、对校舍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认识不足、校舍安全的责任主体比较模糊之外,更为关键的是,相应的

监管机制未能跟上。许多政策依然停留在“规范”和“呼吁”层面,虽然对校舍安全指标给出了明确界定,但鲜有惩治性的监管措施。

在坚固的混凝土结构深处,把校舍建设成真正的第一避难所,同样意味着要赋予校舍一个特别的人文关怀维度。在牢固的建筑中间,流动着的定是某种暖人心扉的细节,这才是安全的全部真谛所在。在美国加州,校舍规划之初,就划定了存放救生绳、安全帽、应急水、耐火救生绳、逃生呼吸器等防震设备的特别区域,以备紧急之需。教室墙壁和课桌外侧都增设了特殊的储藏装置,那里存放着花生、牛肉干之类的高能量食品。显然,这些人性化的细节设计,不仅给了孩子们紧急求生时的希望,还给了孩子们们日常生活中的淡定,因为“心中有数”,所以不再惧怕地震,这种可贵的从容恰恰是校舍安全在人文关怀维度上的微妙注脚。

(作者系西北师大传媒学院副院长)

一周聚焦

专业“吃黄牌”  
高校须警醒

## 校园投毒案,谁之痛谁之过

■陈宝泉